

閱讀「漢代」：1930年前後新視域下的

漢代論述及其學術史上的意義

周志煌

政治大學中文系

摘 要

1930年前後時期之學者，處於新舊思想文化交替、中西學術思潮對話之際，當他們面對屬於漢代邊疆異族或者地方漢墓出土文物之際，不同於傳世文獻的其他漢代史料獲取，「漢代」這一文本符碼（code）提供了這些學者什麼樣的「期待視野」與「召喚結構」？而在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接續發展之中，不同「史觀」立場學者之間的選擇性，也揭橥了他們對於「漢代」的社會結構關注及價值趨向的擷取，而他們又如何利用當時報刊雜誌的傳播效力，闡述他們的漢代相關論述。另外，提供學術社群及普羅大眾閱覽的報刊、雜誌等，在讀者閱讀「漢代」之餘，又是如何進行相關想像與言說，並將相關讀者反應回饋於報刊雜誌，凡此皆值得進一步爬梳。

關鍵詞：1930年前後、漢墓畫像、邊疆異族、下層社會、孫文青、陶希聖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卓見，使本文論述藉由修訂得以深化，謹此致謝。

一、引言

本文所指 1930 年前後，因涉及到中國社會史論戰及邊地史學、漢墓考古等史實，作為本文時代思潮背景之參照，因此大致以 1927 年至 1939 年為概述時間範圍。就漢代研究的「新視域」來說，主要指的是「漢代邊緣」對象的關注與史料蒐羅保存，以及相關論述的開展等。以「歷史上的漢代」而言，屬於下層民間社會結構（包含人口、經濟、風俗……）以及地理版圖的邊疆地域等，都應算是漢代的「邊緣」對象。從 1920、1930 年代考古發現重視邊疆史地之學，漢代邊境的「塞外之史、殊族之文」成為注目對象，連帶的相關學術研究方法也被列入討論。其次，以中國社會史論戰而言，受唯物史觀影響，強調下層經濟決定上層思想結構，不論是漢代社會的經濟生產及風俗民情，以及居住於鄉里的人口及其流動變化，都在「社會史論戰」的氛圍之下被關注。當然，就上世紀 20、30 年代前後的學術氛圍來說，古史辨等有關漢代的大論述，諸如漢代今古文問題，經書偽作問題、陰陽五行思想、孔子形象及儒學在漢代、漢代知識菁英的學說、經子學術……等等相關的研究，甚至 1930 年代上海《教育雜誌》掀起的讀經問題討論，在專書出版及報刊雜誌刊載上也蔚為顯學，但這些研究對象在「歷史上的漢代」來說，仍是較偏向於政治中心、學術菁英的課題，在本文的討論下必須暫時切割。另外，「漢代邊緣」就兩漢分別以長安、洛陽為中央朝廷來說，地理位置在中心以外邊境地區，包含地方諸侯、太守所轄區域，以及邊疆異族的歷史、文化，隨著二十世紀考古探勘的發掘，許多「邊緣」性的漢代文物紛紛出土，也讓 1930 年代的漢代論述對象，增添了許多邊緣性的風貌。

雖然，1930 年代關於此些邊緣性議題的論述者，不盡然都是默默無聞，但相較於位居中研院、北京、清華等名校擔任研究及任教的知名學者，以及史語所集刊或北大、清華等學報之為「一級刊物」而言，這些 1930 年前後於地方教育類雜誌或博物館館刊等邊緣學術刊物撰述漢代研究的學者，仍是一群比較缺乏名氣之人，從撰述者在學術社群的身分屬性來說，也是屬於「邊緣」。再者，以「報刊、雜誌」來說，相較於通俗性、大眾化的報刊雜誌，一般具有學術性質的報刊雜誌，其閱覽者本來就有特定族群而顯得曲高和寡。即使有關漢代相關新聞出現在報紙，也多是與地方或鄰近地區漢代古物的出土有關，這些邊緣性的地方「小報」，相較於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發行量大的報刊雜誌，顯得「小眾」而帶有邊緣性格。

二、「閱讀」與「生活」：漢代與一九三〇年前後之報刊雜誌

近年來受安娜學派（Annales School）對於生活史的強化，日常生活當中關於印刷出版品的閱讀及流通廣為人所注目，尤其結合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等歷史脈絡，讓出版及閱讀等相關研究有了不一樣的面貌。不同的讀者群有不一樣的閱讀知識類型，如果以出版品的物質形式要件而言，書籍以及報刊雜誌結構的組成（張、頁數，規格、版式及版面設計……）等，都因市場需求，必須顧及讀者品味而有所調整。以近現代中國來說，報刊雜誌與出版社往往相互結合，互相拉抬，構成一幅出版編輯者與讀者交流互動的圖像。尤其讀者群的構成、閱讀習慣和閱讀方式，以及閱讀大眾集體心態等等變化的情形，這部分的相關材料都是值得進一步爬梳。1934年主編過《社會與教育》週刊、《文化建設》月刊的學者樊仲雲（1901-1989）就曾經說道：

出版家的眼光，為營業計，往往著重於最能銷售的書的印行，那末第一是教科用書，第二是翻印的古書，待至第三纔是一般供給知識的新書。如翻印的古書，因為買主是最富購買力的人，所以定價不妨較貴。次之教科書，因為學校通用，銷數較大，多中取利，所以定價可以稍低……但在目前，因為社會的不景氣，購讀新書的極少數人都感到貧乏無力，結果造成了出版界與讀書界（此處指真正研究用功者而言）相隔絕的狀態。故當此時，唯一溝通出版界與讀書界的辦法，似乎惟有出版界能系統地編譯新書，而以低廉的定價提供於讀書界。所謂『系統地』者，即分門別類地，有計畫地之意，所以矯正昔日漫無組織，亂出亂印，專事迎合社會風氣的習慣。¹

此文為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出版週刊》轉載《教育雜誌》（亦為上海商務印書館創辦）25卷2號關於「讀書問題」專號討論的文字，可代表當時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方向。尤其對於所謂「真正研究用功者」所需出版的書籍，更是帶有某種出版倫理及社會責任意味的宣達。關於漢代研究專書，以上海商務印書館在1930年代出版為例，包含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鄭鶴聲《司馬遷年譜》；桑原鷺藏著、楊鍊譯《張騫西征考》；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等，都有請專人寫書評或讀書提要，並附上書籍出版事項及價錢等。因書評刊載在自家出版社辦的週刊上，行銷意味濃烈。然有時從書評中也可反映某些學術思潮之情狀。例如筆名克凡的讀者為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所寫的書評就說道：

¹ 樊仲雲：〈讀書界與出版界〉，《出版週刊》，新119號，1935年，頁12。

即在《讀書雜誌》時代，國內學者對「中國社會史」的問題，曾經掀起許多的波瀾，末了還只得了一個空；中國社會史究竟是怎麼一個過程，說來還沒有人能夠有切實的答覆。最近北大教授陶希聖先生主編《食貨》半月刊，據說是要力矯過去從事研究中國社會史者先有「結論」後找「事實」的弊病，而要從各時代記載的「史實」，充分搜集，及有相當成績，然後再求結論。²

透過這篇書評，要強化的是此書撰述「依據舊錄，廣事采獲」的史料豐沛，並以中國社會史論戰之缺失來凸顯此書之價值。除了「書評」以外，「讀書提要」之專欄也可見對於出版書籍的簡介及推銷之情形。例如1924年黃炎培與史量才、馬士傑等人發起創辦了專門搜集史料、編輯圖書雜誌索引的人文類編輯出版機構「甲子社」。1930年，甲子社編印出版以現代經濟史料為中心的《人文月刊》和叢書，《人文月刊》是當時全國首創的檢索刊物。在1933年第4卷第8期的「讀書提要」就介紹張星烺（1888-1951）著《中西交通史料匯編》（按：報刊裡為「匯篇」，據正確書名改「匯編」），裡頭關於漢代部分特別說道：

如漢代和歐洲的交通，普通所根據的，也不過是《史記》《漢書》等兩三部書，但是張先生把《史記》、《前漢書》、《後漢書》、和《神異經》、《海內十洲記》、《博物志》、《西京雜記》、《拾遺記》等，關於對歐洲的記載，都摘錄下來，又益以西方人士對中國的記載，如斯脫拉波、費及流斯馬羅、佛羅魯斯、梅拉、白里尼、拖雷美、包撒尼雅斯等。這樣普通根據《史》、《漢》等一二種書，只知道『大秦一名犁軒』等數語的，于此即可很省事的得到其他許許多多事實或傳說，其有助于研究漢代中國和羅馬的交通，又何待言？³

撰寫提要的是歷史學者梁園東（1901-1968），這種閱讀心得多為讚譽，與一般爭論性的「商榷、料簡、質疑」等評判心得不同，雖有部分源於推廣書籍的目的，不宜太過批判，然而，這一類報刊雜誌當中的書評及提要，在民國以後的閱覽資源上，報刊雜誌的公共屬性，尤為讀書人吸收共同知識，建立公共話語交談的重要「知識倉庫」⁴，也因此諸如「讀者園地」或「書

² 克凡：〈書評：漢代婚喪禮俗考〉，《出版週刊》，新117號，1935年，頁11。

³ 梁園東：〈讀書提要·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人文月刊》，第4卷第8期，1933年，頁2、3。

⁴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一文中，曾列舉了晚清讀書人日記當中所呈現的閱覽書目，這些包含傳統知識與西學的閱讀

評」、「讀書提要」等報刊雜誌欄位所反映的回饋意見，才能成為報刊雜誌對於閱覽群眾的掌握管道之一。當然，這種欄位的讀者，是否全然是真實的閱覽大眾，還是由編者唱雙簧來擔任，就報刊雜誌之職場生態及現實的業績而言，恐難以有效畫出並釐清之間的職業倫理界線。1930年代出版的漢代論述專書，直接回饋的讀者意見莫如書評，另也有像延續社會史論戰、古史辨這種「筆戰」形式的讀者回饋意見（包括專書或專文的閱覽），在1930年前後刊載在眾多的報刊雜誌當中，也蔚為風潮。這些出版商提供的著述及閱覽平臺，某方面引領了學術思潮（包括許多「專題討論」設計），在廣開風氣之餘，也達到「輸佈文明」之效。

三、地方的仰望：漢墓出土及畫像石研究發端

如眾所知，1928年7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正式成立，由傅斯年（1896-1950）代行所長職務。1929年遷北平，將原設八組機構歸併為三個學術組，一為歷史學組，從事史學及文籍考訂；二為語言學組，從事語言學及民間藝文；三為考古學組，從事考古學、人類學及民物學。在第三組成立初期的重大學術成果，即為「殷墟考古」。關於殷墟考古對於民國以來史學的重要意義，王汎森先生曾在〈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⁵一文當中，有非常精闢的闡述。然而文中所運用的材料，多為中央研究院所存公文檔、書信，以及蔡元培（1868-1940）、傅斯年、李濟（1896-1979）等學者相關文字史料，較少運用到地方的報刊雜誌。尤其殷墟考古所涉及不僅是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還有中央與地方對於文物保留及學術話語權爭奪等相關延伸課題。當李濟於1929年在安陽進行考古工作，該年十月，有河南博物館館長何日章（1893-1979）派人帶著河南省教育廳之告示前來禁止中研院的挖掘，並展開對於出土文物是否該運往南京或保留於河南的爭奪（背後還涉及中央與地方軍閥軍事權力的較勁）。王先生文章中特別說道：

可惜，我們沒有何日章這一面的材料可用，未能稽考其史學觀點。不過在中央大學出版的《史學雜誌》中有一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君來函〉，對何日章這邊的工作情況略有

材料，都是他們應付科舉考試、認識時局變化及世界風俗民情，形成一己思想內涵，進一步著書立說的重要資源。同樣的，這樣的觀察也可應用在民國以來探討出版、閱讀相關情形的討論。該文收入《新史學》，第16卷第3期，2005年10月，頁137~170。

⁵ 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描述：「由彼之妻舅警察學校畢業軒君率領『發掘』，無方法，無問題，公然聲言是來找寶貝的。」⁶

何日章據後來漸被發掘的個人史料，他是 1917 年自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畢業，1924 年他被河南省政府委任為河南省裡圖書館館長兼河南民族博物院（今河南省博物院）院長。任職期間，出版《近三年之河南教育》、《圖書館學概論》等個人著述，還為《洛陽石棺考》、《登封如意考》、《新鄭古器圖錄》、《河南圖書館藏石目》等史學專著寫過序、跋，同時兼任河南女子師範學校圖書館科教員。1948 年來臺，1959 年轉任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長，直至退休。⁷以此等資歷，如果真的授意妻舅到中央派員考古現場「搗亂」，應與史學觀點衝突關係較淺，更多的可能是人事方面的紛爭。

王先生文章已談部分，此處不再細說。本文想借用地方報刊雜誌史料，接著講 1930 年前後河南博物館及地方考古的相關學術意義探討。一個與何日章有北京師範校友及博物館共事淵源，且與中研院考古重要成員董作賓熟識的地方中學教員孫文青（1896-1986），連續在河南境內刊物發表了幾篇文章，既涉及漢墓出土文獻，尤其畫像石的重視，也試圖對於上世紀 20 年代後期關於殷墟考古帶來的中央與地方之爭試作調和。孫文青為河南南陽在地人士，1932 年任教於河南第五中學校，其間搜集南陽漢畫像石 270 餘塊。南陽在西漢時為全國六大都會之一，東漢時期為光武帝劉秀的發跡之地，故有「南都」、「帝鄉」之稱。孫文青對於地方出土文物的重視及保存，從 1929 年發表的〈一個小小的提議——河南宜設考古學研究所〉一文中就可看出：

最近因為我國學術界對於古代文化之重視，隨有重行發掘殷墟骨甲之舉。此是最可慶幸的一件事。正因為殷墟骨甲之發掘，而鬧出中央與地方的誤會來，這又是最不值得的一件事。因為這一件小小的誤會，致引起中央的特派傅斯年來汴接洽及地方的組織考古學會。無論其將來的交涉結果如何，必能引起多數人對於河南文化的注意，這是可以斷言的。⁸

⁶ 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頁 183-184。

⁷ 何日章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即在河南省立第一、第三、第五師範學校英文科做教員兼職員，並任河南省教育廳科員。1924 年 5 月，河南省城開封圖書館協會成立，被推為會長。其相關個人資料簡介，參見國家教育研究院網頁：<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82442/?index=6>，以及 <http://www.osk.tw/2014/09/blog-post.html>（最後檢索日期：2016 年 9 月 28 日）。

⁸ 孫文青：〈一個小小的提議——河南宜設考古學研究所〉，《河南教育》，第 2 卷第 9 期，1929 年，頁 1、2。

1929年孫文青時為地方中學教員，並未捲入紛爭之中，且能從「教育」的眼光提出他對於出土文物的教育意義之相關意見。在文中他將此爭議各方意見作了陳述與分析，然後提出他所贊成的是：「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學研究所應該設在古物最多的河南來，殷墟骨甲的發掘保存研究等事都在河南辦理。」⁹他認為這樣的意見是「全以學術研究之方便為主，不分中央與地方」。這種看法若著眼於地方教育，似有道理，但對傅斯年、李濟為主的中研院史語所成員，考古出土史料及其學術價值是「全國性」的，甚至是中國學術與歐美研究「爭勝」的公共資源。當然，人微言輕，處於學術權力邊緣的孫文青及《河南教育》這樣的刊物，其意見也可能無法上達中央。

如眾所知。中研院史語所在廣州籌備期間，傅斯年與顧頡剛（1893-1980）曾有短暫共事經驗，然而後來二人分道揚鑣。除了性格、治學方向的差異，以及學術權力之爭等等因素已被廣泛討論。¹⁰另外，在史語所的學術趨向定位上，由於傅斯年在歐洲所受的比較語言學訓練，加上受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實證史學的影響，認為歷史學的學科目標是再現歷史的真相，要實現這個目標，唯一的方法是全面搜求，並客觀地處置史料。因此，史學的對象是史料，歷史學的範圍是史料學或者說是「史料處置學」。中央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在傅斯年的帶領下，一開始走的即是「專精」、「提高」學術研究與外人爭勝的路線，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即提到：「我們不做或者反對所謂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現在中國希望製造一個新將來，取用材料自然最重要的是歐美的物質文明，即物質以外的東西也應該取精神於未衰敗的外國。歷史學和語言學之發達，自然於教育上也有相當的關係，但這都不見得即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幾個書院的學究，肯把他們的一生

⁹ 孫文青：〈一個小小的提議——河南宜設考古學研究所〉，頁2。孫文青提供了他的建議及實質運作辦法如下：一，請中央研究院設考古學研究所於河南，專辦考古材料之徵集發掘；二，考古學研究所暫設於河南博物館內，以便於整理保管及陳列；三，遇必要時中央得於河南中山大學特設考古學講座，以便隨時指導研究方法並發表研究成績；四，考古材料，徵集及發掘，可由考古學研究所領導任之；五，考古材料之整理及保存，可由考古學研究所及河南博物館共同任之。各種材料之全份保存在河南博物館，重份保存在首都博物館，三份以上由雙方同意方存於必要各地；六，考古材料之研究，可由考古學研究所協同中山大學任之；七，考古成績之發表，可由考古學研究所整理在平滬印行之；八，考古研究所之工作在河南者暫以殷墟之發掘整理研究為中心，俟經費充裕時再漸次推廣，他處進行工作仍繼續進行。

¹⁰ 關於此可詳參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中國文化》第12期，1995年，頁224-237。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古今論衡》，第1期，1998年，頁4-29。王汎森：〈傅斯年與陳寅恪〉，《中國文化》，第12期，1995年，頁238-241。

消耗到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了一這一行的學術。」¹¹相較於傅斯年來說，顧頡剛在成學過程及古史辨相關討論中，受益於民間詩歌、戲曲、神話、傳說、信仰頗多，對於庶民文化作為史料運用以及民眾教育方面特為著重。他曾提及：

傅在歐久，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角勝，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為欲與人爭勝，非一二人獨特之鑽研所可成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積疊無數資料而加以整理，然後此一二人者方有所憑藉，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須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將學術淺化也，乃以作提高者之基礎也。¹²

就此「普及」立場而言，孫文青立場顯然近於顧頡剛而疏於傅斯年。這段文字於顧頡剛年譜是放在 1928 年四月春天，為顧潮根據《顧頡剛日記》1973 年 7 月補記編入。中研院史語所成立於 1928 年，3 月的時候，先於廣州中山大學籌設，聘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三人為常務籌備員。7 月才正式成立，由傅斯年代行所長職務。在籌設時期，史語所於四月下旬、五月上旬編寫〈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大綱〉、預算表、集刊目、工作計畫書等，顧頡剛原都參與起草工作。後因與傅斯年意見相左而不參與其事。然現今在史語所 1928 年 10 月印行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 本第 1 分最後「所務記載」當中，刊載同年稍早 5 月時署名「顧頡剛、傅斯年提議」所撰寫的〈造像徵集啟〉，內文特別說道：

中國自漢以來，外國物事流入中國者，何代無有，而以六朝唐世為尤繁，藝術歌樂每以胡名，固不僅「木窟隨天馬，葡萄逐漢臣」而已。夫以亞歷山大為名之城，見於班勇所記（烏戈山離），敘述印度日耳曼民族民族容體習俗，出於張騫所述，則知自西漢時中國已與希臘波斯文化區域及吐火羅等之先世有接觸，後來歷傳必有影響，中國人只於此等事之流變，略而不注意耳。……大規模之搜集材料，誠此一線工作上至要之圖也。……若不先將存在材料群聚之，視其因時代之變遷，因地方之變遷，則識印竹於大夏，發燕幣於美洲，單件孤證，徒滋誤會者矣。茲擬由研究所分別委託人士，並請古物保管會之合作，先將一切刻石造像塑像壁畫等，為系統之搨拓及影照，並分別定其年代（其可能者），然

¹¹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 本第 1 分，1928 年 10 月。

¹² 顧潮：《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52。

後為一部分之工作者，可有詳細之憑借，為比較之研究者，可得
不局促之資料，必能發啟新知識，糾正舊空虛也。¹³

這裡頭所述延續傅斯年認為「史學即史料學」，成立史語所意在廣徵史料的立場，以漢代而言，包含「一切刻石造像塑像壁畫」等「非文字」的材料都是歷史研究對象，同時，就上述文字來看，特別提到漢代與異族的接觸，可含括「希臘波斯文化區域及吐火羅等」。在〈造像徵集啟〉中還特別說到法人福舍（A Fonche'r）對於「歐藝東漸」的相關研究已發其端，而德人格林韋都（Gruenwedel）及勒高克（Le Coq）等研究「雖此兩君著作有時過於作結論，有時又類幻想，然此種線絡有甚多待尋之寶藏，可斷言也。不知有此道路斯為墨守之愚，據局部之所得，擴為廣溥之論，亦致函莽之禍。」¹⁴當此文指出德籍學者研究缺失之處，正足以給中國學者競逐而讓研究提升的機會，此與外人「爭勝」的企圖，也正符合傅斯年辦史語所的初衷。

位居學術殿堂中央的史語所，想藉由漢代文物與外來文化之關係做比較研究，並藉之以與外人爭勝。然位於學術邊陲的地方，卻反而是漢墓發掘及文物出土史料的「原鄉」，在同時期 1930 年代的報刊或雜誌，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關於漢代古墓發掘及文物出土的報導，例如：1932 年《鐵路月刊：津浦線》刊載：〈徐州發現漢代古墓（上、下）〉，裡頭還驚悚寫道：「屍長丈餘頭大如斗，在本路東子房山西麓，三種陶器均係漢柏磚質，路工造屋所得現繼續趕掘。」¹⁵另，《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33 年第 8 卷第 5 期、《燕京學報》1933 年第 13 期也都同時報導了「滕縣發現漢代石室」，尤其燕京學報更將此漢代石室的發現，視為是「文化史上空前之創獲」：

山東滕縣安上村農民陳世發兄弟以耕地掘獲古銅器十四件，事為省政府所聞，特派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氏及省府候差員張書紳，女子習藝所所長劉獻庭等親赴該處調查，並運濟保存。王氏奉命赴滕，因遊覽曹王墓而發現漢代石室，及畫石數千方，誠我國文化史上空前之創獲。¹⁶

曹王墓為曹操之父曹嵩的墓穴，曹嵩死後，曹操回到中原，挾天子以令諸侯，迫使漢獻帝追封其父為曹王。墓葬位於山東滕縣，除曹王墓外，所在村落也有著其他豐富的漢墓群。報導中提及的王獻唐（1896-1960），於歷史、

¹³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 本第 1 分，頁 113、114。

¹⁴ 同上註，頁 113。

¹⁵ 〈徐州發現漢代古墓（上、下）〉，《鐵路月刊：津浦線》，第 2 卷第 4-5 期，1932 年。

¹⁶ 〈（甲）學術機關消息：1.滕縣發現周代古物及漢代石室〉，《燕京學報》，第 13 期，1933 年，頁 240。

考古、金石、文字、音韻、訓詁、版本、目錄學等多個領域都有所涉獵，孔德成先生之金石學即受教於王獻唐。1929年掌山東省立圖書館，就頗重視文物收藏。1930年10月3日與傅斯年信札中就曾說道：「先生來函，述及清代漢學正統派。獻唐昔年治學，頗撿拾鄉先輩許印林先生緒餘，以音求義，以義求音，其術殆出於高郵，蓋印林為伯申先生弟子故也。近歲漸悟清人所治聲音訓詁，多為死音訓詁，古自古，今自今，結果只造成一種古董式之學術，供人玩賞而已。」¹⁷由信函中可見其非傳統學究，且於文獻之概念已擴及器物，而非僅在紙本圖書而已。

對於漢代畫像石的學術價值，以及需搶救的理由，《燕京學報》的報導也作了分析：

歷來所發現漢代畫像雖多，但皆係斷片；至何種畫像用諸牆壁，何種用諸柱石，皆未能考得。此次石室發現後，畫像之種類及用途皆得藉以證明；同時漢代宮室建築形式亦可得而知。石室畫像極多，雕刻精粗不一，且漢畫石遺棄地面及山上者不可勝數；惜鄉愚無知，或以之建築房屋，或以之修築廟宇、橋梁，殊深浩歎！¹⁸

這樣的報導透露的學術眼光，顯然已經脫離晚清甲骨發現一直到1928殷墟考古前，大家對於有「字」文物的著迷，文獻與歷史關係的鉤合過去都是建立在「文字」記錄上，即使器物如甲骨、鐘鼎等也是如此。然現代考古與史學的接榫，顯然包含文字以外的其他圖像、器物等等。這種眼光隨著殷墟考古發掘以後，漢墓在1930年前後陸續被發現，其圖像之為可貴史料也逐步為人所重視。當然，除了山東滕縣以外，更值得注目的是前述所提到的孫文青，因其所居南陽為兩漢重要城市，漢墓出土文物隨時可聞。由於南陽既為孫文青家鄉，其治學趨向及領域又多在漢代，除與漢代畫像石有關出版的《南陽漢畫象訪拓記》、《南陽漢畫象彙存》、《南陽草店漢墓畫象集》的研究外，1935年亦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張衡年譜》，另外，結合其對天文、曆算等帶有科學性之知識的興趣，孫文青也分別於1931、1932年在《女師大學術季刊》、《金陵學報》、《師大月刊》等刊物，發表在東漢成書，現存最早的中國古代數學著作之一的《九章算術》相關研究，包括：

¹⁷ 王獻唐：〈復傅斯年書〉，《山東圖書館季刊》，1982年第1期。此外，王獻唐也對傅斯年說過：「從前治金石文字，其材料但能求之地上，不能求之地下，但能求諸文字經史方面，不能求諸社會學、生物學、地質學。故其效果，偏於臆度，而缺乏實驗，偏於片斷，而缺乏系統。此非古人聰明不及今人，實其憑借不及今人耳。晚近數年以還，國人治學，漸變前此虛矯之習，趨篤實，其代表此篤實學風，真正運用科學方法，整理新舊材料，不墜其人窠臼者，實以貴院為先導，此非獻唐一人之私言也。」同上。

¹⁸ 《燕京學報》，第13期，1933年，頁242。

〈九章算術源流考〉、〈九章算術篇目考〉、〈九章算術篇目考〉等文章。其在漢代學術研究，相較於1930年代其他漢代學術研究的學者，可說是獨樹一幟。其曾自述說道他與漢墓文物結下的因緣：

余之留心是藝，則在民國二十一年春。時予任教五中，既聞宗墓石獸，有移城保存之議。復見此項石刻，多散露廊階之間，因略加追研，恆以不知其石之部位功用為苦。適有同事，語及草店漢墓沖發者。爰即往訪其陳迹。果於是役，得窺石室之全形。多日積悵，為之頓釋。¹⁹

在文字中可以看出其並非受過考古專業訓練，作為地方中學教員（河南第五中學校），純為興趣及求知精神所驅使，展開對漢墓石室的相關探索。如果對比中研院幾年前傾國家人力、財力在河南安陽所做考古工作，相較之下，河南地方人力及經費運用所能投注在漢墓部分，顯然甚少而力有未逮。且孫文青認為「自是以還，董彥堂兄因有回宛發掘之議。事雖未果，然旋即移其精力於魯之曹王墓，而從事山左漢畫之釐整。彼所成就，實較南陽為多。予則以二年之力，搜拓地面殘石，結果不過得片百餘幅。餘石雖眾，然已窘於力矣。」²⁰在參與殷墟考古的董作賓，以及河南博物館館長何日章，他們的學術眼光對於殷墟「字骨」的注視是甚於其他出土文物，相較於此，身為董作賓好友，並曾為何日章同事的孫文青，其史料概念及學術眼光之擴大與提升，顯然超越董、何二位。況且孫文青尤重畫像的史料價值。在他看來：

嘗考人類記載，率由圖騰而進於文字。環球民族，既莫不如此。而吾國兩漢以前，文字形體，且未能完全折衷一致。則圖象之見重于當日人類社會，應不亞于文字。以文字雖便於記載紹述，然實已近於符號機械，不若圖象之聲（按：應為「生」）動藝術，且易於辨識也。……從兩漢後之製作刻文等，尚多附花邊紋飾，而單純圖象，仍與並行；至今猶然；矧在兩漢及其更前，必為圖多於文，似可斷言。²¹

如果說，甲骨、鐘鼎、石碑……等器物上的文字研究，是舊學傳統欲探求歷史的重要媒介，則對於器物上花紋、圖飾等線條圖像符號的看重及相關研究，這種學術眼光在1930年代，可以算是「新學」的趨向。循此，孫文青認為「幸以此役之拋引，國內外之注意者眾，……其將來撰成論文，刊

¹⁹ 孫文青：〈南陽草店漢墓畫象集自序〉，《河南博物館館刊·藝文》，第5期，1936年，頁6。

²⁰ 同上註。

²¹ 同上註，頁9。

為著述，以作兩漢學術問題之佐證者，當不知凡幾。其為功又豈僅在散見碑銘，熹平石經下哉？」²²這樣的意見，相較於古史辨以降學者多所討論漢人偽造經說（如劉向、歆父子）的氛圍，可以說孫文青等提揚了漢代留給後人的學術思想資源頗為「真實」且更接近庶民生活（畫像石中的神話宗教服飾等日用之常）的史料面向。尤其在信仰層次上，不同於後代士人、庶民受佛道影響的宗教型態，漢代保留的是更多巫祝型態的信仰內容：

南陽畫像，出土雖多，然其所含因素，不過僅帶有五行圖讖之迹；尚不甚濃。含因最濃者，則為鄒衍學派之山海經，即圖中奇形怪獸，及龍身人首是。不惟外來之佛教色彩，在此時墓葬圖象中，尚未受其影響；即本土之方士神仙，在此墓葬圖象中，亦未受其若何影響；則亡人超渡等事，當尚未流行，佐治喪葬，當亦不假助於僧道；其代人佐助喪葬，禳禍乞福者，實仍為巫祝之輩。²³

雖為「巫祝」信仰型態，然從畫像石中，孫文青仍能進一步追問這種信仰型態的來源，並非佛道二教影響，亦非西域之經典、方士之符籙、民間祝禱神鬼等等，而是有其更豐沛的知識型態內容，包含「天象、地域、歷史、禮樂、遊戲、祥瑞」等等，這些畫像內容都來自於「帝王所提倡之圖籍」，然就圖籍內容來說，天象圖、地域圖……等內容應難以全部進入墓室畫像當中，因此孫文青判斷：

墓石所刻者，不過僅掠取其中一部分，用作圖案，或僅以當日受賜者上石，或僅以其墓石能容者施雕，故祇能表現其圖象之局部，而略示其意；欲尋當日各類流傳全圖於墓中，仍為勢之所難能。因當日墓刻圖象，不過僅為殉葬之一種工具，或石室一種圖案，或時人一種好尚，若非後之刻經造像等，有意作系統之流傳。²⁴

這樣的學術判斷完全是現場勘查記錄所得，在 1930 年代，既無前人知識傳授或專書可供依循，且在研究當中，能避開「以今衡古」之弊，以為所有畫（造）像的作者都是「有意作系統之流傳」。若依傅柯（Michael Foucault, 1926-1984）所揭示的「系譜學」（genealogy）知識，單一決定論往往有其侷限性，學者在歷史想像中，往往強調單一、連貫、線性的歷史發展方式並以之作為歷史詮釋的基準，卻往往忽略歷史演進當中破碎的歷史片段，在動態變化當中各種組合的可能？所謂「歷史的本質」，也不過是由破碎的

²² 孫文青：〈南陽草店漢墓畫象集自序〉，頁 7。

²³ 同上註，頁 12。

²⁴ 同上註。

時間片段所組成。²⁵當二十一世紀兩岸學者重視漢代畫像石、圖像磚研究，相較於今，1930年代位處學術邊緣地帶的孫文青可以說是走在學術前沿的。且孫文青是有學術新知之人，從其研究漢代張衡並做年譜；闡述漢代《九章算術》一書；²⁶討論漢墓中的星象及鬥獸圖，將之投稿刊載在《科學畫報》，從民初學術界強調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來說，其治學顯然並非傳統路數，就其整體學術表現而言，其所開啟的漢代新視域及研究是不應該被忽略及埋沒的。

前述王獻唐因遊覽「曹王墓」而發現漢代石室，而1928年因山東省濟南市龍山鎮城子崖遺址的發掘，發現了代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因1930年河南陷入中原內戰狀態，殷墟考古不得不暫時中斷，而恰逢吳金鼎（1901-1948）在山東城子崖遺址考古有所發現，因此史語所的考古重心就由河南移到山東。當時正掌山東省立圖書館的王獻唐，本與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等人交好，現從後人編撰的《王獻唐師友書札（上下）》當中，仍可看出出入新、舊學之間的王獻唐與史語所諸位先生的情誼。且此時「中研院史語所」與「山東省立圖書館」的關係是密切合作的，從《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1930年第2卷第6期、1931年第2卷第7期分別刊載〈關於發掘山東龍山城子崖案〉、〈龍山城子崖古物整理報告書〉，顯見這在當時是院務重點工作項目之一，而《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也在1931年第1卷第1期刊登龍山文化主其事者李濟所寫的〈發掘龍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績〉，另，李濟在1935年《東方雜誌》也發表〈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一：城子崖發掘報告序〉就特別說道：

在古史新運動的初期，那反對疑古派所執為最充足的理由是怕堯、舜、禹的黃金時代若打倒，就會影響到人心。骨子裡的意思大概是說假如我們要把中國上古的文化說得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子，我們民族的自尊心就要失掉了。這點感情雖是不十分合

²⁵ [法]米歇·傅柯（Michael Foucault）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4年），頁259、260。

²⁶ 孫文青之所以撰文討論漢代《九章算術》一書的源流，其背後既挾帶著科學求證的學術精神，也有民族情感作用在裡頭。他自述撰文之因即在於：「因為十七年的東方雜誌廿五卷八號上有一篇胡懷珍君的〈墨翟為印度人〉辨，力言墨翟為印度僧人來華傳教。同卷十六號有鄭師許一篇〈駁義〉，吳進修一篇〈指正〉，都是反對胡君之說的。更有一篇〈墨翟續辨〉，是胡君對於反對各說答覆，並補原辨所不及的。續辨的最後一項——其四，是說明墨經中的幾何學實出於印度者。墨翟是否為印度人，墨經中之幾何學是否果出於印度？因我對於這些問題未曾加過研究，不敢隨便亂說，不過其中提到了《九章算術》及《孫子算經》等，硬說這些算書也是從印度書中譯出來的，當時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孫文青：〈九章算術源流考〉，《女師大學術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頁4。

理，動機卻很純潔，且是極普遍存在的。好多成熟的科學家與哲學都免除不了。外國人帶了這種感情來論中國事，無形之中就要把中國的民族史看得比他本國的格外不同一點。被誤解的人自然也要想法子自衛，是非曲直，非特難斷定，反愈鬧愈糾紛了。……要是我們能把城子崖的黑陶文化尋出他的演繹的秩序及所及的準確範圍，中國黎明期的歷史就可解決一大半了。²⁷

李濟此段話既揭示了古史辨運動以降，對於中國古聖先賢形象及儒家經典多斷定為偽作，而強調將之「打倒、破壞」所可能產生的民族自信喪失等問題。而另一方面，面對從清末以降外國人進駐中國境內的考古成果研究，以及文物被運往西方的民族屈辱，加上許多外國學者以中國文化「西來說」來展現他們民族文化優越性的學術論斷之際，李濟及其他同儕考古學術研究背後的現實情感是頗為濃烈的。雖然，民族情感是爭勝理由之一，但所憑藉的學術研究方法仍是「科學性、組織性」的，比起古史辨對於信史以前傳說、神話（視之為後人偽造）的摧毀，傅斯年、李濟等人要做的是打倒以後的建設工作。同樣在為「城子崖」發掘報告作〈序〉的傅斯年，在文中曾以「半漢」、「全漢」來戲稱西洋人與中國學者，在漢籍中有關中外關係以及中國史之重要問題思考上的差距。尤其涉及考古部分：

在中國追求於中央及西方亞細亞彩色陶器有親屬關係之中國彩色陶器之分佈，誠然是一件絕重大的考古工作，然中國史前及史原時代之考古，不只是這麼一個重大問題，若以這個問題為第一重心，則仿佛覺得先秦二千年間中土文化之步步進展，只是西方亞洲文化之波浪所及，此土自身若不成一個分子。我們現在所有的知識，已使我們堅信事實並不是如此的。……西洋人作中國考古學，猶之乎他們作中國史學之一般，總是多注重在外緣的關係，每忽略於內層的綱領，這也是環境與憑藉使然。……中國的史前、史原文化本不是一面的，而是多面互相混合反映以成立在這個文化的富土上的。²⁸

這種與外人爭勝所顯現的自豪，來自於其已能從史料的蒐羅當中，建立屬於科學性的史學方法，外國學者的研究常存在著「過猶不及的教訓」：「把

²⁷ 李濟：〈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一：城子崖發掘報告序〉，《東方雜誌》，第32卷第1號，1935年1月，頁3、5。

²⁸ 傅斯年：〈「城子崖」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1934年。另，與龍山文化同為史前文化的仰韶文化，由瑞典考古學者安特生於1921年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他曾斷言中國遠古文化的根在它的本土之外，是由西方經西亞地區傳入的。

設定當作證明，把設想當作設定，把遠若無干的事變作近若有關，把事實惟允許決定的事付之聚訟，這些弊端在傅斯年看來：「都不足以增進新知識，即不足以促成所關學科之進展。」²⁹如果將1930年代傅斯年這樣的觀察及史學方法運用，對照王國維於1925年在《古史新證》當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以及1925年7月在清華大學講演的〈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王國維看到了「漢人木簡」以及「古代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西夏諸國」等異族語言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僅能感嘆：「惜我國人尚未有研究此種古代語者，而欲研究之，勢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諸國。」³⁰王氏一方面反省自身學術界，另一方面並強化需將學術研究對象擴大，向西學『取經』。可以說王國維並未對西方學界的研究缺失有所檢討。此外，傅斯年所著重的也不同于陳寅恪（1890-1969）在1920年代初期面對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等漢學大家的研究成果，希冀能從比較語言學、歷史學來重視「塞外之史、殊族之文」³¹傅斯年等對於西方人學術態度及方法之反省，某部分可以說是傾國家學術資源來做相關研究工作，尤其考古之事及其背後所涉及民族情感，也只有中央研究院有此豐沛人力、物力能作此召喚。

²⁹ 傅斯年：〈「城子崖」序〉。

³⁰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漢人木簡，宋徽宗時已於陝右發見之，靖康之禍，為金人索之而去。當光緒中葉，英印度政府所派遣之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M. Aurel Stein）訪古於我和闐（Khotan），於尼雅河下流廢址得魏晉間人所書木簡數十枚。嗣於光緒季年，先後於羅布淖爾東北故城得晉初人書木簡百餘枚，於敦煌漢長城故址得兩漢人所書木簡數百枚，皆經法人沙畹教授（Ed. Chavannes）考釋。……此項木簡中有古書、曆日、方書，而其大半皆屯戍簿錄，於史、地二學關係極大。癸丑冬日，沙畹教授寄其校訂未印成之本於羅叔言參事，羅氏與余重加考訂，并斯氏在和闐所得者景印行世，所謂《流沙墜簡》是也。……及光緒之季，英法德俄四國探險隊入新疆，所得外族文字寫本尤夥。其中除梵文、佉盧文、回鶻文外，更有三種不可識之文字，……當時粟特、吐火羅人多出入於我新疆，故今日猶有其遺物。惜我國人尚未有研究此種古代語者，而欲研究之，勢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諸國。」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4卷「詩文·文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241、243。

³¹ 余英時曾指出陳寅恪在1920年代初期，對於「塞外之史、殊族之文」有所特別關注，然而1929年以後逐漸轉向「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包括魏晉社會、隋唐政治史等研究，而遠離原來治史對象，原因在於：「以『塞外之史、殊族之文』而言，歐洲的東方學是居於絕對領先的地位。他（陳寅恪）本人的基礎功力在中國雖然首屈一指，但若與第一流的歐洲東方學家相比較，也並不特別超出。所以他承認在中西文化交通、佛教傳播及中亞史地等領域內，深受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的影響。而且東方學在歐洲早已形成有規模的傳統，後起者除了在某些『點』上尋求新的突破外，很難取得典範式的新成就。」余英時：〈陳寅恪史學三變〉，《中國文化》第15、16期，1997年12月，頁5。

四、「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漢代木牘、雕飾的語言歷史及文化韻味

如眾所知，晚清以來西北史地吸引了很多學者的注意，研究西北史地似乎一時成為風氣，其中外籍學者在中國境內從事考古發掘等工作，雖含藏帝國主義因殖民所需，必須對於相關地理版圖的相關知識背景有所掌握之因外，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從事相關地理探勘考古的外籍學者，也往往由於他們一己對於知識的好奇及求真的研究態度，使得他們在漢族以外其他相關民族及邊境史地的研究上，大抵帶來許多突破性的研究成績。1920年代，王國維、陳寅恪兩位史學大家都曾在「殊族之文、塞外之史」方面下過工夫，也就是利用中亞出土新文獻，從比較歷史語言學的角度切入，進行的佛學、蒙藏、西夏之學研究，陳寅恪對於蒙、藏、西夏、梵文等語言的精熟固不待言，即使王國維對殊族之文未能有效掌握，但也透過日文、英文著作，認識歐洲漢學界對於中國歷史中所謂異族及邊境地理的研究成果。而正由於王國維之引介，讓陳寅恪有了與伯希和進一步交流的契機。然而王國維、陳寅恪等人，仍主要從文獻角度進行研究，並沒有親身去西北和塞外地區考察。1930年代以降，歐洲及日籍學者關於漢代及中亞地區史地關係的著作，有些被陸續譯介出版，也加深了中國學者對其研究的掌握。梁園東（1901-1968）曾在雜誌的「讀書提要」中介紹羽溪了諦著、賀昌群譯的《西域之佛教》一書（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特別指出：

「西北地理」，在中國也算一種專門學問，但自何秋濤、李光庭、徐崧之諸人以次，對於西北知識，也不過根據歷史籍，鈎稽釐訂，與以參訂而已，並未能有所發現。光緒間洪鈞藉使俄之便，始採譯多桑《蒙古史》等書，輯為《元史譯文證補》，始溢出中國人所知西北史地之範圍，頗為近人稽考西北地理者所根據。但其書既未完成，且近四十年來，西人對於東西土耳其斯坦各地之考查，已超過前者遠甚。³²

中國學者對於西北史地研究晚清時期已發其端，然而就學術方法及成果而言，仍不及西人。在梁園東看來，漢武帝以後，繪畫雕刻之傳入，佛教之輸入，皆與西域各國有重要關係。對於中國與西域古史的「全盤歷史知識」的建立，自是刻不容緩。異族史地研究不止洋人專擅，日人一樣精通：

日人自那珂通世以來，開東洋史學研究之風，名家輩出，對於滿蒙史地，西域史地，南洋史地，皆多有創獲；因而對於中國史之了解，時超過吾中國人遠甚。……中國人欲抵抗日人之侵略，實

³² 梁園東：〈讀書提要·西域之佛教〉，《人文月刊》，第4卷第10期，1933年，頁1。

有難能者在，此並非吾個人短氣語也。近賀昌群先生譯日人羽溪了諦之《西域之佛教》，以饗吾人，頗使吾人於『抵制日貨』之空氣下，有不得不接受之感！³³

尤其1931年代開始，日北關東軍發動瀋陽事變，在東北扶植滿洲國的成立，民族情感挾帶吸收新知的糾結，也讓當時遊走於書局編輯、中學、大學教員身分的學者梁園東不免有此感慨。對於漢代西域等邊地民族史記文化之瞭解與研究，其意義不僅是學術的，也包含民族及政治作用的。³⁴

如果被王國維稱譽為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界有四大發現之一「漢、晉遺簡」來說，1930年的學術團隊是由中國和瑞典學者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額濟納河沿線調查漢代的烽燧遺址。並於同年四月，由團員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Folke Bergman, 1902-1946）在額濟納河下游附近的漢代塢堡中，發現了346枚簡牘，貝格曼繼續在額濟納河流域調查居延烽燧遺址，採集到約1萬枚漢代簡牘。由於這一帶屬漢代張掖郡的居延或肩水縣，因此出土簡牘被統稱為「居延漢簡」。當時中國主要參與學者為地質學家袁復禮（1893-1987），袁復禮於1927-1932年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1932年以後創辦了清華大學地質系，並擔任系主任。由於袁復禮的專長在地質，採集新石器時代遺物是他在西北主要的工作。而另一要角黃文弼（1893-1966）則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1934-1937年任西北科學考察團專任研究員。其在羅布淖爾北岸發現了石器時代遺址，發掘漢代烽燧遺址，據實地考察所得，論證了樓蘭、龜茲、于闐、焉耆等漢代西域古國及許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演變。在1929年《圖畫時報》第535期曾刊登黃文弼照片，由擔任西北科學考察團團長的徐炳昶（1888-1976）報導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察經過。另《地學雜誌》1930年第4期有黃文弼〈樓蘭與漢代之關係〉一文刊載；《西北史地》1938年第1卷第1期也有黃文弼〈兩漢通西域路線之變遷〉一文，足見其在1930年代對於漢代邊境民族及相關交通考察研究的心得。

³³ 梁園東：〈讀書提要·西域之佛教〉，頁2。

³⁴ 梁園東192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在校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於太原等地從事組織地下工作，並於中國社會史論戰期間發表過多篇專文。九一八事變以後，在對抗日敵的民族情感上，是不分國、共兩黨的。以當時國民政府來說，對邊境相關研究也開始重視。1930年，戴季陶、馬鶴天等開始醞釀成立「新亞細亞學會」。籌備期間，他們先在上海籌建「新亞細亞月刊社」，發行《新亞細亞》月刊，在《新亞細亞》創刊號上即聲明，其使命是「為整個中國建設而研究中國的邊疆」、「為實現民族主義而研究東方民族的解放」，研究範圍是中國邊疆和整個東方民族，包括中國的東北、西北、西南等邊疆地區，以及東亞、南洋、中亞、南亞、北亞等一切東方民族地區。探討包括民族理論、邊疆史、周邊鄰國等地理物產內容，某方面也兼具戰略研究。「新亞細亞學會」除發行《新亞細亞》雜誌外，並出版叢書、組織邊疆考察、舉辦邊疆文物展覽會。

在 1930 年代西北與漢代史地有關的考察當中，史語所可以說是缺席的，³⁵ 在這期間進行的考古，也未看到史語所有與其他團隊合作的跡象。如果再以當時史語所最重要的刊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來看，從第一本第一分於 1928 年發刊，到 1939 年集刊第八本第四分，總共發行 32 期 219 篇文章，與漢代文、史、地等學術直接相關僅有 7 篇，在集刊發行十年間所有篇數比例僅佔 3%，且全由勞榘（1907-2003）一人所撰。間接相關的部分從篇名來看，也僅有余遜〈漢魏晉南北朝東北諸郡沿革表〉（1936 年第六本第四分）一篇。而史語所集刊第一篇漢代專文的出現，一直要到 1935 年集刊第五本第一分，才由勞榘「拔得頭籌」，連續在同期及下期刊出：〈漢代奴隸制度輯略〉、〈鹽鐵論校記〉、〈漢晉閩中建置〉（以上三篇皆集刊第五本第一分）；〈兩漢戶籍與地理之關係〉、〈兩漢郡國面積之估計及口數增減之推測〉（以上二篇皆集刊第五本第二分）。以上五篇專文皆可說是傳統文獻的治學成果，尚不涉及 1930 年代以後對於漢畫像石及漢簡的研究，勞榘要到 1939 年集刊第八本第一分才撰寫〈論魯西畫像三石—朱鮪石室、孝堂山、武氏祠〉這篇文章，涉及漢墓研究。而其學術成就最為人所稱頌的「居延漢簡」研究，要到第 1939 年八本第二分〈從漢簡所見之邊郡制度〉才正式登場，已近上世紀 30 年代尾聲。雖然史語所在 1930 年代對於蒐購漢畫拓片及漢簡保存等，有其史料蒐羅之價值；但在研究著述上，如此統計數據，應可說明全國最高學術機構在漢代研究的投入，是比不上地方學術團體及各大學學術機構。從 1920 年代後期中研院史語所成立，到 1930 年中期左右，漢代相關文獻以及考古研究，並非史語所的顯學，自從顧頡剛離開史語所後，勞榘加入之前，就史語所內部主要成員來說，以漢代為學術專業的學者幾乎是空白的。1930 年代所謂漢墓考古幾乎是「地方」為之，漢畫像石、漢簡研究並未在 1930 年代初期進入史語所的學術核心。相對的，以顧頡剛為主所領導的古史辨，以及以陶希聖（1899-1988 年）參與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在 1930 年前後來說，漢代學術及歷史社會等多多議題面向，仍持續熱絡發酵中。

就目前所看到 1930 年代報刊雜誌關於漢代的記述報導中，另有一英年早逝，久為學術界遺忘的滕固（1901-1941），早年畢業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留學日本、德國柏林大學，攻讀文學和藝術史，1932 年獲美術史學博士學

³⁵ 史語所團隊直到 1944-1945 年期間，才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等加起來共四個學術單位，另組成一種「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新疆兩地進行考察。其中史語所考古組的考察只限於甘肅境內，參加者有向達、夏鼐、閻文儒等三人。調查發掘項目主要有：臨洮寺窪山、廣河陽窪灣的史前遺址和墓葬；漢代的玉門關和長城遺址；敦煌附近的六朝和唐代墓葬；武威附近的唐代吐谷渾墓葬。

位。其在1930年代於學術圈頗為活躍，且與清華才子錢鍾書交誼甚深。其學術專業橫跨藝術史、美術、建築、考古等，另於文學創作及繪畫方面都專擅，在上世紀30年代的重要文藝報刊雜誌《小說月報》、《創造季刊》上，都可看到他的文學才華展現。滕固在1935年《學藝》第14卷第4號發表〈漢代北方藝術西漸的小考察〉，此文是譯自Zoltjen de Takacs所著的“From Northern China to the Danube”一文，文中討論到幾件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Francis Hopp」東方藝術博物館收藏從中國北方出土的漢代銅器，與布達佩斯在地出土可能代表匈奴西遷的遺留飾物、銅器等文物做比較，其中特別討論到一個銅器上的圖案：

第十圖（即第九圖）野獸瘦小的形體，和中國式的獸形不同，其原因由於從亞洲東部遷移到多瑙河，長途跋涉，失去了牠的魁梧的軀體，而成為瘦小的怪獸。這種獸形乃是所謂「凱士德利風格」之最普通的意匠。這兩種形式雖有這樣的差別，但第九圖（即第十圖）的匈牙利出土的獸形，卻是由中國式遞嬗出來的，是中國的野獸跟了匈奴西遷後產生的。³⁶

原作者指出將漢代文物或中國野獸遷徙帶到歐陸的，是漢代邊防最大的敵人匈奴。滕固特別翻譯這篇討論圖像的研究，來反映中西文化遷徙交流的鑿痕，在1930年代算是非常特殊的。從其藝術專業來說，並不特別拘泥於「西來」或「東漸」等爭執。在另一篇其親自考察漢代「霍去病墓」並留影刊載的圖、文當中，他如是說道：

霍去病墓上的石蹟，已分明地顯出外來的影響了。所謂外來影響可分二層說，其一是用為石刻對象的野獸不是中國固有的野獸，例如馬和水牛等，就其形狀，都來自中亞細亞或西方亞細亞，……尤其是跪著或伏著的野獸雕刻，宛如斯鳩提（塞種）—西伯利亞（Scytho-Siberian）區域，稱為「加孟雅貝比」（Kamennya Baby）山上的石物。此種動物藝術的形式，固為南西伯利亞及塞種的，然更古則為美索不達米亞的風格。……在東漢尚有一種有翼獸遺留於今日，有翼獸通常稱為天祿和辟邪。這也是外國的野獸……此種野獸從伊蘭高原傳入的，自無疑義了。今流傳的河南南陽宗資墓的石獸，據歐陽修的記述，謂二石獸膊上，一刻天祿，一刻辟邪，是他於天聖（約公元一〇二六）中親眼看見的。³⁷

³⁶ 滕固：〈漢代北方藝術西漸的小考察〉，《學藝》，第14卷第4號，1935年，頁3。

³⁷ 滕固：〈霍去病墓上石蹟及漢代雕刻之試察〉，《金陵學報》，第4卷第2期，1934年，頁

這裡從漢代墓葬當中的雕飾風格，連結漢代中國與西伯利亞、中亞交通及文化藝術交流，尤其征戰匈奴戰功彪炳的霍去病，其死後墓葬所在動物藝術之雕刻正來自於其自己所征伐過的區域。不僅如此，滕固還進一步延伸討論河南南陽宗資墓的石獸，墓葬雖存在千年以上，歷代學者文人如歐陽修之輩雖有所見，但他們的學術眼光自不能與今日相比，也遑論從文化人類學、比較藝術史的角度來看待漢墓的動物石刻雕像。做為藝術史學者，漢墓之於滕固呈現的是更多感性的材料：「霍去病墓上的雕刻，在簡略渾樸中存有不可抵抗的一種鬱勃的力量，隨處流露著一種蠻性的倨傲，這正是反映著當時代漢民族向外發展的精神。積無數健兒生離，死別，行旅，戰爭，掠奪之悲壯的經驗而構成了當代一般神聖高貴的信念。」³⁸文字中的民族情感與藝術氣息相互輝映。

五、中國社會史論戰接續：漢代的下層社會與邊緣身分

1930年前後的民國學術史上，另有一指標可以用來理解漢代研究新視域及論述開展的，就是在「中國社會史論戰」及「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之後，有關中國底層社會結構及生產經濟模式的討論。1920年代後期，左翼學者為了配合「革命」的需要，發表大量有關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字討論，1930年前後，「唯物史觀」在通俗報刊及非主流的雜誌當中有大量篇章的刊載，參與社會史論戰的人士，其分析歷史、社會對象雖在中國，但援引的相關比較對象往往是歐洲歷史及社會，所據以分析的理論，也往往直接套用從西方歷史經驗歸納出的社會型態、經濟模式等理論，包括唯物史觀等。為使聚焦於漢代相關論述，此處不對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來龍去脈多做贅述，而以相關刊物的刊載文章來做說明。

以1934年12月1日由陶希聖負責創刊的《食貨》為例，主要提供學者發表中國社會經濟史方面的研究文章，在創刊號〈編輯的話〉裡，陶希聖說道：「史學雖不是史料的單純排列，史學卻離不開史料。理論雖不是史料的單純排列可以產生，理論並不是原形一擺，就算成功了的。……中國社會史的理論鬥爭，總算熱鬧過了。但是如不經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問題的提出和解決，……那進一步的理論爭鬥，斷斷是不能出現的。」³⁹換言之，理論的套用如果沒有足夠的史料提供說明，則空泛的討論並不具備說服力，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瞭解仍有其侷限及盲點。雖然《食貨》的創辦要以史料的豐沛來代替空洞的史觀陳述，但仍不妨礙沿用過去中國社會史論

145、147。

³⁸ 滕固：〈霍去病墓上石蹟及漢代雕刻之試察〉，頁149。

³⁹ 陶希聖：〈編輯的話〉，《食貨》，第1卷第1期，1934年，頁29。

戰時期，喜歡拿歐洲歷史社會現象來做比較參照的研究方法。例如在 1935 年第 1 卷第 6 期刊登陶希聖草擬的〈食貨學會本年六項工作草約〉，文中就說道：

以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來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史，雖為時不久，但中國經濟社會史的問題曾經試行解答或已全解答的，不在少數；史料曾經搜緝的更多。……要想對中國經濟社會史精深研究，必須就外國的經濟社會史得到精確的知識。……今舉幾種重要參考資料如下：(a) 歐洲資本主義初發生發達時的各種現象，例如手工作坊、定貨制度、賬簿組織等。(b) 歐洲及日本等處的封建制度。(c) 封建制度初生時的現象。(d) 中古歐洲的東部，與商業經濟同時存在的封建制度。(e) 教會及寺廟財產制。(f) 資本主義以前的帝國與資本主義發達時的殖民地侵略。(g) 殖民地經濟組織的特徵。……本年對中國經濟社會史研究，除通史的準備以外，注意於每一史料的時與地。並漸進於分時的研究（斷代經濟史）及分地的研究（地方經濟史），一掃從前往往往以別為通的缺點。⁴⁰

這樣從歐洲社會及經濟制度、財貨生產經驗來作為參考的研究方法及趨向，加上著眼於「分時」、「分地」的範圍縮限，都讓兩漢社會相關議題有了嶄新及深化的風貌。例如陶希聖對於漢代「客」這一身分的研究，有別於過去研究總是環繞在以宮廷政治權力中心的帝王將相身分，或者著眼於握有學術話語權的儒生角色，陶希聖獨具隻眼，開發了另一種社會身分：「客」的相關命題。在〈西漢的客〉一文中他說道：

「客」這個名辭，從來不受人特別注意。我注意到客的社會的意義，是近四年的事。……西漢的客雖是中古的客的先驅，但與中古的客，性質是相反的。中古的佃客莊客乃至客作，是生產的；反之，西漢的客是不生產的。中古的客養活主人，反之，西漢的客受主人的養活。……秦漢之際，軍事首領以客為軍事幹部，是常見的事情。⁴¹

「客」的身分從戰國時期就已存在，陶希聖認為戰國至西漢所謂「俠」，即是養客或結客的人的名詞。由於「客」的身分具有流動屬性，客於主人的

⁴⁰ 陶希聖：〈食貨學會本年六項工作草約〉，《食貨》，第 1 卷第 6 期，1935 年，頁 1、2。

⁴¹ 陶希聖：〈西漢的客〉，《食貨》，第 5 卷第 1 期，1937 年，頁 1、2。該文也同時刊登在《月報》1937 年第 1 卷第 1 期；《文摘》1937 年第 1 卷第 2 期。

家族，並沒有固定的關係。從戰國時期各國公子（如孟嘗君）養客之風，客以握有權力者為投靠對象，來來去去，從中雖顯示他們對於政治權力靠攏選擇的自由，但從另一面來觀察，也正顯示這一流動身分背後其「邊緣」性的角色存在，他們可因投靠對象的失勢而選擇離開，相對的，這些「客」也常常會因其他人的得寵而被迫遠離他們原先投靠的權力中心。當然，也有少數的「客」是盡忠於主人，為社會所稱道。如田橫的客五百人，全數自殺以殉其主。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客」的作用也會跟著有了調整。在另一篇〈王莽末年的豪家及其賓客子弟〉文章中，陶希聖指出：

在社會政治活動的方面，客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軍事方面，客往往構成其中的幹部。客如屬於養客的豪家，則其體力智力便貢獻於豪家，大奴主大地主。客如由貧苦的人們自動結納，則其體力智力便幫助了貧苦的民眾。客雖沒有「自己的階級」，也沒有「為自己的階級」，但在社會階級的抵觸衝突裏面，他們是助手，甚至於是幹部或組織人。⁴²

隨著社會階級的漸趨分化，客因其奉獻對象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社會功能及作用的發揮。陶希聖認為王莽的限田及限奴政策，以及干涉商業高利貸的計畫，得罪了豪宗大族及豪商巨賈，因此豪家以子弟賓客結合成反抗軍隊，推翻了王莽政權。⁴³當然，這樣的分析對象是建立在史料完整的羅列舉證上，但不可否認的，這種對漢代社會邊緣人物與權力中心者之間互動關係的研究，其新穎的學術眼光正是反映了 1930 年前後中國社會史論戰下的接續。

《食貨》從 1934 年 12 月創刊，到 1937 年 7 月停刊的二年半中，前後共出版了 61 期，吸引了全國各地學者發表了 300 多篇論文，包含鞠清遠、楊聯升、全漢生、何茲全等年輕初試啼聲的學者，大多是在陶希聖的鼓勵下，通過《食貨》而走向學術道路。《食貨》內容除了少數外國社會經濟史理論的翻譯，以及延續社會史論戰中有關中國社會形態之討論外，絕大多數是具體社會史及經濟史的研究文章，其中最多的是有關社會身份、人口、家族、土地制度和田賦租稅等方面的研究；其次是關於農業、貨幣、市場、都市、貿易、寺院經濟等內容，此外還包括一些關於婦女、婚姻等社會史方面的議題。以漢代為例，韓克信〈兩漢貨幣制度〉、黃君默〈兩漢的租稅制度〉、戴振輝〈兩漢奴隸制度〉、吳景超〈西漢奴隸制度〉、傅安華〈東漢社會之史的考察〉、陶希聖〈西漢時代的客〉……等，都是分別在 1935 年至 1937 年之間於《食貨》刊登。

⁴² 陶希聖：〈王莽末年的豪家及其賓客子弟〉，《食貨》，第 5 卷第 6 期，1937 年，頁 46。

⁴³ 同上註。

除了《食貨》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型態的關注，其他報刊雜誌在1930年前後一樣有許多專文，討論漢代士族社會、婚姻，乃至宗教信仰等議題。關於漢代士族與社結構的關係，梁園東在〈門閥觀念不始於魏晉考〉一文中就特別指出：

近日研究中國社會史者，由于歷來史學家之謬誤分析；對於漢晉間之社會，遂致無法理解，因魏晉六朝之顯明的階級色彩，而在其以前之兩漢時代，反較為淡泊，不足對比，遂致疑于中國封建社會，實當在魏晉六朝以後，兩漢當為奴隸社會，而東西周間乃為更前之氏族社會，更有甚者，至有謂魏晉間五胡之侵入，亦確可當于歐洲封建時代以前日耳曼人之遷徙，故致中國封建時代于魏晉之民族遷徙後，尤有歷史之必然性！種種附會之論，不一而足。⁴⁴

當時一般學界多以魏晉六朝門第觀念，來強化論述「世族」、「豪族」在政治社會權力掌控。然而社會之進化，並非突變，梁園東認為：「地主對於農民之超經濟的剝削方式，秦漢後幾仍完全保存，在此種關係下，其由具有特權之地主階級的存在，因而產出具有一般權力的特殊階級，實為當然之結果。兩漢之統治權力，即由此種特權階級所把持。」⁴⁵因此這種門閥特權階級之形態，並非始於魏晉，魏晉世族大姓門閥的權力壟斷，其源頭從兩漢豪族就可見端倪。梁園東曾於1930年寫過〈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⁴⁶，文中對於顧頡剛領導及編著的《古史辨》多所批評，認為中國上古史是一本「糊塗帳簿」，結果顧頡剛想要清理，提出所謂「層累地造成說」的學術方法，這在梁園東看來，不過是一種「神奇妙術」。⁴⁷如果對照梁園東從中國社會史論戰吸收的養分，以及個人政治信念及唯物史觀的方法論運作。當顧頡剛的古史辨著重摧毀而不重建，重視揭偽過程而不言求真之結論，古史辨相關論述在討論中國社會史學者的眼中，其學術方法既是傳統的訓詁辨偽考訂，其學術眼光也只是故紙堆裡頭的遊戲，更不用說學術研究能為現實政治、社會提供怎樣的「意識形態」運作，乃至改造政治、社會「行動力量」背後的工具作用。同樣的，1933年仍在清華大學史學系當學生的吳晗（1909-1969），顯然也感受到中國社會史論戰及當時清華校園左

⁴⁴ 梁園東：〈門閥觀念不始於魏晉考〉，《史地叢刊》，第1卷第2期，1933年，頁3。

⁴⁵ 同上註，頁4。

⁴⁶ 梁園東：〈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續二十二號）〉，分別刊載於《東方雜誌》第27卷第22號、第27卷第24號，1930年。

⁴⁷ 同上註，《東方雜誌》第27卷第22號，1930年，頁65。

翼學者治學風尚的影響。其在校園刊物《清華週刊》發表〈漢代之巫風〉，即著眼於探討封禪書中的「神君」與「西王母」，以及漢代占筮之書《焦氏易林》所反映的漢代巫風及民俗信仰。文中於末特別引《禮記·雜記下》：「子貢觀於蠟。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一段話，強調：

「一國之人皆若狂」恰好拿來形容建平四年正月的事件（按：指京師歌舞祠祭西王母，以及門樞白髮符應、佩書不死等巫風盛況），同時也是說明焦氏易林中關於農村社會情形。……外戚丁傅、幸董賢等用事，不恤國政，窮奢極淫……政治上的鬆懈病態及於社會，並且深入農村。在發生農村經濟崩潰的過程中，產生一種所謂民族的歇斯迭裡亞症。⁴⁸

用馬列唯物史觀來說，下層生產力、生產關係等經濟結構，決定上層政治、思想、文化結構的發展。從漢代歷史及社會現象來說，漢代皇室重視巫俗，從武帝時發生巫蠱之禍即為一端，而其巫俗來由正源於民間信仰。當農村經濟崩潰，人民生活愈趨困苦，則巫俗之風也就越興旺，從而也改變了上層結構的歷史面向。除了吳晗之文章，類似的筆觸還有吳紫金〈兩漢民間的暴動與貴族及大地主與大商賈及與政治之關係〉，收入《文筆》，1939年第1卷第8期。奚祝慶〈兩漢人口之比較〉，分別刊於《史學》，1930年第1期、1933年第2期。吳景超的〈兩漢的人口移動與文化〉一文，則分兩期刊登在《社會學刊》1931年第2卷第4期、1932年第3卷第2期。劉秉仁〈兩漢的人口與食糧政策〉一文，刊載在《禹貢》1937年第7卷第1-3合期。以上僅列舉一二說明此種類似的研究趨向。

由於階層及空間流動的變化，社會史論戰中，會衍生出對於人口、民族「遷徙」、「流動」的重視。人口的流動讓社會結構、型態有所改變，「流動」之為議題及探索對象，不僅符合社會史論戰關注的階級變化問題；若於民族關係來說，流動遷徙也消解民族關係的對峙，促進文化交流融合的可能。

六、餘論：學術思想史上的意義

「漢代」作為中國歷史當中的意象「符碼」，既是結束秦強權暴政的時代，亦是開啟獨尊儒術的源頭。且尤其在跟邊疆異族相關的中西交通、文

⁴⁸ 辰伯：〈漢代之巫風〉，《清華週刊》，第39卷第1期，1933年，頁51、52。吳晗甫入清華校園，即顯示出超乎同儕的學術能力，用「辰伯」的筆名在《清華週刊》上連續發文近二十篇，入學第二年被該刊聘為《清華週刊》文史欄編輯主任。

化交流史上，都可以連結到漢代盛世氣象，展現某種「華夏」民族精神的象徵作用與意義。關於此，王明珂曾指出：

漢代是「中國人」異族意象與自我意象形成的關鍵時代。主要原因是：(1) 漢帝國是華夏形成後第一個維持較久的統一帝國，這時中國與四裔族群的關係，是形成中國人異族意象與自我意象的關鍵；(2) 漢帝國勢力在東亞的擴張，達到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態地理極限，以及帝國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極限；(3) 漢代是中國有系統的「正史」記載之始，文字歷史記憶，使得在漢代形成的華夏自我意象與異族意象沿續下去，深深影響後世的中國人。⁴⁹

1930年前後對於漢代社會「下層結構」及異域邊疆地區的相關研究，既有學術思潮、相關論戰、學術方法（包含中、西之學比較）……等學術思想史上的意義，另外，政治上的中央與地方對於學術資源挹注運用的看法落差，以及在中、日衝突節節升高，學術研究背後所顯現的民族情感作用等等，都讓漢代相關論述在這樣的歷史氛圍當中有其特殊的價值與意義。

另外，現代出版社、報刊雜誌社於1930年代林立，其印刷出版品促進了知識的流動，且在閱覽對象群上，各種書籍及報刊雜誌的內涵、屬性，也能提供不同知識階層的人們閱覽吸收。以出土文物來說，其「在地性」的知識也能透過現代傳媒吸引有興趣的讀者加以吸收，並回饋一己的心得或進行不同意見的商議論辯。另外，報刊雜誌當中不同的版目及欄位，有時也提供給我們另類的資訊管道來源，除了本文「引言」中所提及的出版品介紹，並請專人寫書評或讀書提要作為行銷策略外，譬如學術性的雜誌，有時也提供了更多出版品知識背景的掌握與瞭解。1937年孫文青集先前數年蒐羅研究南陽漢墓畫像之心得，於1937年6月抗戰前夕的南京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又出版了《南陽漢畫象彙存》一書，而已在日本人掌控北平淪陷區發刊的《燕京學報》，於1938年第23期刊物當中的「國內學術界消息」介紹此書出版的緣由及南陽漢畫像發現之始末。⁵⁰這些在孫文青的

⁴⁹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第十章 漢人的形成：漢代中國人的邊疆異族意象〉（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頁290。

⁵⁰ 其報導如下：「南陽東關省立高級中學，為清宛南書院舊址，係明代古剎東大寺改建。其殿宇石基有用漢畫石者，遺跡猶存。惜時人不知其可貴，咸以常石目之。民國十二年間，邑人董彥堂，楊章甫兩君，始有所發見。十七年冬，張中孚君以堪災回宛，始詫其多，搜拓數十品返汴，交關百益君為之整理刊布，成《南陽漢畫象集》一冊（中華書局出版）。于是南陽漢畫象，始漸聞于世，然猶未詳其石之功用也。二十一年春，孫君任教于河南第五中學校，既聞宗資墓石獸有移城保存之議，復見畫象石刻多散露于廊階之間，恆以不知

書中也許不會細談的成書原委、近遠之因。但在報刊雜誌類於學界動態的報導之中，更活絡及再現了作者及書籍的相關知識背景影像。且報刊資訊的流通互相轉載，於知識網絡的成型，其所能提供的閱讀效應，都是現代知識形塑及傳播所需探討的重要課題。也因此本文探討 1930 年前後對於漢代的閱讀，選擇報刊雜誌，而非一般學界探討某人閱讀經驗所著重的個人日記、讀書雜記等，所藉重的就是報刊雜誌的公共性格，提供了大眾而非個人的閱讀契機。且這些閱讀大眾可以含括地理空間、社群屬性位居於「邊緣」的人士。當然邊緣的身分不會一成不變，主流中心也隨時會移動擺盪，中心／邊緣之分只是作為一種觀看的視野及分析策略之運用。尤其，在歷史思潮及學術發展史上，我們除了要注重一些重要論述的出版，同時也要蒐羅對這些出版品的相關閱讀回應，以漢代為例，顧頡剛《漢代學術史略》1935 年 8 月由上海亞細亞書局出版，這是 1930 年代漢代研究的里程碑著作，也因其影響深遠，1955 年稍作修訂改名為《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出版，其論述觀點及相關史料基礎大抵維持原樣。當然，除了類似這種少數幾本劃時代的著作外，有時一些名不見經傳，但數量極多的著述，因其藉用傳媒的廣泛擴散，也在 1930 年代另外一些學術階層及社群當中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王汎森談到近現代受進化論影響底下的諸多著述，曾有以下觀察：

史學實作的變化，顯然不是在幾篇里程碑文獻出現之後，就一齊俱變的。里程碑文獻當然掀動一時之人心，不過講到實際變化，則要兼顧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受各式各樣書籍或範例影響的情形。所以我們要兼顧兩面，一方面是里程碑式文獻，另一方面是在各種場合模仿、套用成書，習得各種新的書寫範式的歷程。當時（按：指近代中國）有不少既不標榜史學方法、甚至不提新理論，而是直接模仿、類比、套用翻譯或各種成書的例子；而類比、套用是一種新說深入擴散的重要基礎。⁵¹

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反思，1930 年前後這些漢代有關的「邊緣」論述，有時基於學術身分或位居的學術地帶，或者甚至發言的邊緣刊物，基於上述的某些條件影響，其相關論述是否全為「原創」或有所「襲仿」？即是「襲仿」，是否可能是在前作「影響」之下的繼承，由繼承而產生仿擬、批

其功用為憾。時適縣屬之草店有漢墓發現。得窺其石室之全制，乃著〈南陽草店漢墓畫象記〉（見二十二年十月六日《國聞週報》十卷四十一期，本報十四期本欄亦有轉載）以表彰之。更竭二年之力，蒐拓地面殘像，又益以平昔所得畫象計共百四十五紙，以成此書。」《燕京學報》「國內學術界消息」，第 23 期，1938 年，頁 315。

⁵¹ 王汎森：〈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新史學》，第 19 第 2 期，2008 年 6 月，頁 6。

判，或延伸不同路向研究的對應態度。例如劉揆藜（1899-1935）、婁景斐兩人合撰發表〈漢代之婚姻奇象〉一文，劉揆藜曾在顧頡剛主導古史辨的討論當中，多持異說反對，其意見廣為學界熟識。〈漢代之婚姻奇象〉該文刊出後，上海青年協會書局出刊的《優生》雜誌於1931年第1卷第1期曾有書評介紹，可見其人著述之迴響。〈漢代之婚姻奇象〉專文其中列舉「漢代婚姻奇象之事例」，包括「舅父甥與女婚配；表叔父與表姪女婚配；表姑母與表姪子婚配；姊妹分配一家父子；其他戚屬之亂次婚配；……」等共十三項⁵²，在依項分析後，於結論中說道：

此等奇象，多為後世所無；而在漢代，常常有之，並不為怪。以帝室王侯公卿士大夫猶且如此，足知民間奇異之婚姻必甚多也。惜乎史籍所紀，不及人民，故純然民間之婚姻異象，無從考知。……漢代一夫多妻之制盛行，與寡婦再嫁之絕不為社會所輕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中，其例更多，不可勝舉。但此兩件事在中國古今任何時代，均為常事而非特殊之婚姻現象，故此文不及之焉。⁵³

文中已特別說明「漢代一夫多妻、寡婦再嫁」，在中國古今任何時代均為常事，並非婚姻奇象，然社會學教授吳景超（1901-1968）撰寫的〈兩漢多妻的家庭〉於1931年《金陵學報》第1卷第1期（創刊號）刊出，〈兩漢寡婦再嫁之俗〉於1932年《清華週刊》第37卷第9-10期合刊刊出，吳景超兩篇接續劉揆藜等專文之後，且從「反向操作」撰文，其間關係頗耐人尋味。而1930年代兩漢相關論述，「同題共作」者甚多，⁵⁴尤其在借用西方知識理論以及史觀框架之餘，有多少是「襲仿」前人或外人著述？層次或比例到什麼樣的地步？都值得做進一步深入的討論。

⁵² 劉揆藜、婁景斐：〈漢代之婚姻奇象〉，《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1卷第2期，1930年4月，頁261。劉揆藜曾擔任成都大學、武漢大學等校史學系教授，為反對顧頡剛古史辨的重要史學家。劉揆藜的弟子陶元珍曾於1935年撰〈亡師新化劉揆藜先生事略〉說道：「十二年，吳縣顧頡剛君揭其懷疑古史之說於讀書難志。先生以其引據多疏，疏解尤不衷於理也，乃再作長函以辟之。源源本本，殫見洽聞，具見《史地學報》及顧君所輯《古史辨》第一冊中。由是海內學者，無不知有先生。」《國風》7卷1期，1935年9月。

⁵³ 同上註，頁278、280。

⁵⁴ 例如談「兩漢貨幣」有：郭垣：〈兩漢貨幣制度的研究〉，《中國經濟月刊》，1934年第2卷第9期。韓克信：〈兩漢貨幣制度〉，《食貨》，1935年第1卷第12期。談「奴隸制度」，有戴振輝：〈兩漢奴隸制度〉，《食貨》，1935年第1卷第7期。武伯綸：〈西漢奴隸考〉，《食貨》，1935年第1卷第7期。吳景超：〈西漢奴隸制度〉，《食貨》，1935年第2卷第6期。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此處限於篇幅，無法將諸多「同題共作」詳細羅列，然此一現象實值得進一步關注探析。

徵引文獻（依作者姓氏筆劃為序）

一、專書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

顧潮：《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法〕米歇·傅柯（Michael Foucault）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4年。

二、期刊及專書論文

〈（甲）學術機關消息：1.滕縣發現周代古物及漢代石室〉，《燕京學報》，第13期，1933年。

〈徐州發現漢代古墓（上、下）〉，《鐵路月刊：津浦線》，第2卷第4-5期，1932年。

《燕京學報》「國內學術界消息」，第23期，1938年。

王汎森：〈傅斯年與陳寅恪〉，《中國文化》，第12期，1995年。

——：〈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

——：〈近代中國的線性歷史觀——以社會進化論為中心的討論〉，《新史學》，第19第2期，2008年。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4卷「詩文·文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

王獻唐：〈復傅斯年書〉，《山東圖書館季刊》，第1期，1982年。

余英時：〈陳寅恪史學三變〉，《中國文化》第15、16期，1997年。

克凡：〈書評：漢代婚喪禮俗考〉，《出版週刊》，新117號，1935年。

吳景超：〈西漢奴隸制度〉，《食貨》，第2卷第6期，1935年。

李濟：〈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一：城子崖發掘報告序〉，《東方雜誌》，第32卷第1號，1935年。

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中國文化》第12期，1995年。

——：〈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古今論衡》，第1期，1998年。

辰伯：〈漢代之巫風〉，《清華週刊》，第39卷第1期，1933年。

武伯綸：〈西漢奴隸考〉，《食貨》，第1卷第7期，1935年。

孫文青：〈一個小小的提議——河南宜設攷古學研究所〉，《河南教育》，第2卷第9期，1929年。

- 孫文青：〈九章算術源流考〉，《女師大學術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
——：〈南陽草店漢墓畫象集自序〉，《河南博物館館刊·藝文》，第5期，1936年。
- 梁園東：〈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東方雜誌》，第27卷第22號，1930年。
——：〈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續二十二號）〉，《東方雜誌》，第27卷第24號，1930年。
——：〈門閥觀念不始於魏晉考〉，《史地叢刊》，第1卷第2期，1933年。
——：〈讀書提要·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人文月刊》，第4卷第8期，1933年。
——：〈讀書提要·西域之佛教〉，《人文月刊》，第4卷第10期，1933年。
- 郭垣：〈兩漢貨幣制度的研究〉，《中國經濟月刊》，第2卷第9期，1934年。
- 陶元珍：〈亡師新化劉揆藜先生事略〉，《國風》第7卷第1期，1935年。
- 陶希聖：〈編輯的話〉，《食貨》，第1卷第1期，1934年。
——：〈食貨學會本年六項工作草約〉，《食貨》，第1卷第6期，1935年。
——：〈西漢的客〉，《食貨》，第5卷第1期，1937年。
——：〈王莽末年的豪家及其賓客子弟〉，《食貨》，第5卷第6期，1937年。
-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
——：〈「城子崖」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1934年。
- 劉揆藜、婁景斐：〈漢代之婚姻奇象〉，《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1卷第2期，1930年。
- 樊仲雲：〈讀書界與出版界〉，《出版週刊》，新119號，1935年。
- 滕固：〈霍去病墓上石蹟及漢代雕刻之試察〉，《金陵學報》，第4卷第2期，1934年。
——：〈漢代北方藝術西漸的小考察〉，《學藝》，第14卷第4號，1935年。
- 潘光哲：〈追索晚清閱讀史的一些想法—「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新史學》，第16卷第3期，2005年。
- 戴振輝：〈兩漢奴隸制度〉，《食貨》，第1卷第7期，1935年。
- 韓克信：〈兩漢貨幣制度〉，《食貨》，第1卷第12期，1935年。

三、網站檢索

<http://www.osk.tw/2014/09/blog-post.html>。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82442/?index=6>。

